



紅學史論

王人恩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集美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基金

红学史论

王人恩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学史谏论/王人恩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4
ISBN 978-7-04-047454-1

I. ①红… II. ①王… III. ①红学-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7895 号

红 学 史 谏 论
Hongxueshi Jianlun

策划编辑	孙璐	责任编辑	孙璐 张岩	封面设计	王鹏	版式设计	童丹
插图绘制	杜晓丹	责任校对	张薇	责任印制	尤静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http://www.hep.com.cn
邮政编码	100120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http://www.hepmall.com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http://www.hepmall.cn
印 张	18.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定 价	59.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7454-00

自序

如果我们可以把脂砚斋、畸笏叟等曹雪芹的“至亲好友”评点《石头记》看作红学史的源头的話，则红学史已经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钱锺书先生早在其巨著《管锥编》中指出：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

“红学”的确经历了发生、发展、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成长阶段，才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红楼梦》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它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艺术魅力能够强烈地吸引红学研究者、红学爱好者进行苦在其中而乐亦在其中的艰难探索，并乐此不疲。而在整个“红学”研究中，红学史的梳理、“红学”学术史的总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贤今哲于此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红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或缺贡献。

拙著之所以题名为《红学史谏论》，一是书中内容属于红学研究中的红学史的范围，二是与许多红学研究者的著述相比，拙著实属浅薄之列。古语有言：“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正因此故，难脱经生结习的我仍然想就拙著的内容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红学史谏论》厘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的前半部分内容涉及《红楼梦》中大观园究竟在哪里、《红楼梦》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哪里、索隐派的一些重要观点、几首题红诗赋以及杨掌生与《红楼梦》、钱锺书与《红楼梦》、茅盾与《红学札记》等内容。其中，我用力最勤者是钱锺书与《红楼梦》，其次是杨掌生与《红楼梦》。

我第一次知道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是在1980年下半年，当时吾师郭晋稀先生给我们开设《诗经》研究课，在他油印的讲稿中有十几处引用《管锥编》。郭先生认为国内研究《诗经》的大家，钱先生应该算一个。这是我喜欢、崇拜、研究钱锺书的缘起。凑巧的是，1984年3月，我赴武汉参加教育部委托湖北大学举办的全国高等院校元明清文学讲论班，在武汉买到了《管

锥编》一至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从此开始阅读《管锥编》，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管锥编》很难读，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该书是用文言文写的；二是该书用了六种外文：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意文、西班牙文，再加上典雅的古文，故有人称钱锺书在“七度空间逍遥”；三是该书内容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大部分以及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管锥编》博大精深，钱先生既是诗人、小说家，又是学者，他对古代小说非常熟稔，新见迭出，我逐渐发现钱先生评价《红楼梦》的见解真可谓发前人未发之义，辟前人未辟之境，认为红学史当留片席之地与钱锺书。因此，我撰写了《钱锺书与〈红楼梦〉》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该刊还作为重点文章“推荐”了此文，其“编后记”云：

本期的两篇研究钱锺书的文章值得推荐。……一篇谈钱锺书与《红楼梦》，钱锺书毕生未曾写过一篇研究《红楼梦》的专文，他说“红学”边界太宽、“饭碗太大”，他还嘲笑过这个学科内一二滑稽的人物。但钱先生并不与“红学”绝缘，他发表过不少有关“红学”的精辟见解，涉及《红楼梦》的主旨、人物、意象、譬喻、技法等多重文化内涵，他关注“红学”的研究史，他鞭辟入里批评王国维“悲剧之悲剧”说，他指点“红楼”，发潜阐幽——“发前人未发之义，辟前人未辟之境”，真所谓“参禅贵活”，“舍筏登岸”，站立上一个无人企及的高岸。作者隔岸仰视，撰述此文，用心甚细，用功甚巨，于断丝迹中理大茧，于片言语间缀深义，或恐有郢书燕说之微嫌，终不碍探骊得珠之巨功。——于钱学于红学均是一份可喜可贺的成果。

该刊后一期“编后记”又云：

钱锺书研究是我们热衷的一项工作内容，也是一项长期的学术工程。第二期我们刊载的两篇钱锺书研究的文章得到学术界许多好评，本期我们再推出《钱锺书散论尼采》。

《文学评论》给予我的鼓励非常巨大，同时也增加了我研究钱著的自信心，因为在《钱锺书与〈红楼梦〉》一文中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文字写得不够深入，一些看法有必要进一步申述，因此我又写了《钱锺书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评论》一节。2007年，我开始给硕士研究生上“《管锥

编》导读”的课程，这门课很受研究生和旁听的博士生及青年教师的喜爱，在授课和讨论的过程中，我对教学相长的含义有了全新的体悟，研读钱著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所幸者，2014年我以“《管锥编》破解古代文学学术陈案研究”为题，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并获得批准，《钱锺书释“老健春寒秋后热”》一文正是该项目的前期成果。总之，我研究《红楼梦》和研究《管锥编》等钱著的时间起点大致相当，对二者的研究一直齐头并进，不偏不倚，如此的研究方式能给我踏实自信、相辅相成的感觉。

我对杨掌生与《红楼梦》的研究虽然开始较晚，但关注杨掌生及其《京尘杂录》则始自1990年。由于资料缺乏，学界对杨掌生的研究出现了不少错误的认识和结论。2007年，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杨掌生《实事求是斋文钞》《留香小阁诗词钞》《实事求是斋杂存》《留香小阁诗词文》，为我们研究杨掌生和《京尘杂录》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既可以纠正学界已有的一些错误认识，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杨掌生及其《京尘杂录》的价值。我在《杨掌生与〈红楼梦〉》上、下篇中，就杨掌生的名、字、别号，生卒年，与阮元的交往，因科场案遭戍辰溪，服刑十年的经历以及死因等做了全新的考论，同时较详细地论述了杨掌生独特的红学观。研究杨掌生与《红楼梦》的过程比较艰辛，我光去厦门大学图书馆查询资料就不下十次。

上卷下半部分主要讨论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红学研究史，内容涉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大家及其著作，如潘重规及其《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林语堂及其《平心论高鹗》、李辰冬及其《红楼梦研究》、杜世杰及其《红楼梦考释》等。起因是我2009年以“台湾地区近六十年红学研究史论”为题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如愿得到了资助。因此，我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研究台湾地区的红学研究，着重选择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作进行研读，仔细而慎重地分析其观点的来龙去脉和高下得失。其间，大陆看不到的资料，我还拜托台湾的朋友复印相寄，我的研究成果也曾寄往台湾请教，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尤其是红学的交流做了一点点添砖加瓦的工作。

下卷主要讨论日本红学家森槐南与《红楼梦》，属于日本红学史的研究范围。我之涉足日本红学，纯属偶然。1995年，我在翻阅晚清著名文人王韬的作品时发现了《〈补春天传奇〉题辞》六首，王韬的诗作唱叹有致，颇有韵味。经过研读，我撰写了《〈补春天〉传奇新考》一文，发表在《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那时我仅根据王韬《〈补春天传奇〉题辞》六首绝句的内容推测出《补春天》传奇的内容是写明末清初著名才女冯小青事，并说“至于槐

南的姓名、里居、其创作《补春天》传奇的时间，以及剧作的详尽内容，只好等待方家进一步探讨了”。之后不久，我收到了《文学遗产》编辑部转来的一封信，写信者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大正大学教授饭田吉郎先生。他信中告诉我，森槐南是日本红学家，《补春天》是森槐南的传奇作品。经过通信联系，我得到了饭田吉郎教授惠赠我的《补春天》和《深草秋》的复印本，以及有关森槐南的部分资料。于是我陆续写出了《森槐南与〈红楼梦〉》上、中、下三篇系列论文。我在《森槐南与〈红楼梦〉（上）》中指出：《红楼梦》对森槐南有一定影响；森槐南是日本第一个《红楼梦》译者，《补春天》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后来，影响甚大的《日本红学史稿》的作者、著名红学家孙玉明先生在其专著中肯定了我的研究，认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将《森槐南与〈红楼梦〉》收入其“参考文献”之中。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对《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所涉及的“梅史”、王泰园（名治本，以号行）和《大河内文书》所涉及的“两王”即王治本、王藩清诸人的生平履历，我做出了比较清晰的论证，对以上诸人传播《红楼梦》的功劳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经过日本友人的帮助，我又得到了森槐南的《题红楼梦后》七律四首，并做了一定的述论——之前孙玉明先生曾托友人查找此诗，而“未能找到”，感到“遗憾得很”——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孙先生的遗憾。回首《〈补春天〉传奇新考》一文，的确是宝玉所谓“小时候干的营生”，它提醒我要有放眼域外的目光，才有可能摆脱井底之蛙之讥。

曹子建《求自试表》有言：“冀以尘露之微，补益山海；萤烛末光，增辉日月。”拙著正是想给“红学”的山海、日月增补一点色彩。

目 录

上卷 / 1

- 大观园的原型究竟在哪里? / 3
- 关于《红楼梦》的地点问题 / 16
- 评红学索隐派的“明珠家事说” / 20
- 评红学索隐派的“宫闱秘事说” / 28
- 评王梦阮、沈瓶庵的“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 / 34
- 评谌卢的《红楼梦发微》 / 52
- 黄金台与《红楼梦》 / 63
- 杨掌生与《红楼梦》(上) / 73
- 杨掌生与《红楼梦》(下) / 86
- 钱锺书与《红楼梦》 / 95
- 钱锺书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评论 / 113
- 钱锺书释“老健春寒秋后热” / 123
- 新发现的茅盾《红学札记》述论 / 128
- 新发现的林钧《题陈厚甫红楼梦填词》诗发微 / 142
- 丁繁培《题〈红楼梦〉》诗初探 / 150
- 新发现的时铭《题吴藉亭〈红楼梦传奇〉十二首》诗发微 / 154
- 评李知其的《红楼梦谜》 / 160
- 评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上) / 167
- 评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下) / 178
- 论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上) / 190
- 论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下) / 201
- 《平心论高鹗》: 林语堂对俞平伯、周汝昌等
大陆红学家的反驳 / 215
- 李辰冬对潘重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的
“疑问”读解 / 223

下卷 / 237

森槐南与《红楼梦》(上) / 239

森槐南与《红楼梦》(中) / 255

森槐南与《红楼梦》(下) / 263

日本森槐南《补春天》传奇考论二题 / 272

主要参考文献 / 278

索引 / 284

后记 / 287

上

卷

大观园的原型究竟在哪里？

大观园是贾府为元春归省而营建的省亲别院，由元春亲自正式命名，《红楼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跃于其中，它无疑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典型环境。因此，《红楼梦》问世后不久，围绕大观园的原型、地点、园林建筑等问题，众多读者以极大兴趣进行探索，其讨论的热烈程度足可说明它是红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大观园虽然是《红楼梦》所创造的一个典型环境，但是，它是否是作者凭空创造的？如果不是，那么，它究竟有没有生活原型、素材来源？笔者拟就此学术争论做一检讨。

一 南京随园说

最早提出大观园即随园的人是与曹雪芹同一时代且极有可能与曹雪芹有过交往的明义，他在《题红楼梦》二十首诗的序中说：

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①

在《和随园自寿诗韵十首》之一中，明义写有“随园旧址即红楼，粉腻脂香梦未休”的诗句，并有自注：“新出《红楼梦》一书，或指随园故址。”^②从明义的口吻看，他极有可能与曹雪芹相识，他又见过《红楼梦》的早期抄本，他提出的大观园即随园一说因此影响甚大，其后袁枚也持此说，他在《随园诗话》（道光四年刊本）中写道：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③

①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1 页。

②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 12 页。

③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 13 页。

随园位于清代上元县境,当时南京城区分属上元、江宁两县管辖。其遗址在今南京市广州路的两侧,亦即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之间。明义、袁枚二人的根据何在,都不曾明言。明义的甥辈裕瑞在《枣窗闲笔》中承袭了袁枚的说法,他说:“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①可笑的是,袁枚的孙子袁祖志竟毫不相信乃祖之说,认为随园说乃“吾祖谰言”,并且主张将这句话从《随园诗话》中删去。与袁枚同时代的周春明确表示反对随园说,他在《阅红楼梦随笔》中声言:“袁简斋云:‘大观园即余之随园。’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②嘉、道间人诸联《红楼评梦》也指出:“袁子才《诗话》,谓纪随园事,言难征信,无厘毫似处。不过珍爱倍至,而硬拉之,弗顾旁人齿冷矣。”^③1915年5月民权出版部之《古今小说评林》载有太冷生的文章也反对随园说:“《随园诗话》中老人自云:‘《红楼梦》中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此老可谓脸厚。”^④尽管许多人反对随园说,但仍不断有人肯定随园说。1921年,胡适发表了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红楼梦〉考证》,其中论道:“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红楼梦》里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我们考随园的历史,可以信此话是不假的。袁枚的《随园记》(《小仓山房文集》十二)说随园本名隋园,主人为康熙时织造隋公。此公即是隋赫德,即是接曹頔的任的人。(袁枚误记为康熙时,实为雍正六年。)袁枚作记在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去曹頔卸织造任时甚近,他应该知道这园的历史。我们从此可以推想当雍正六年去职时,必是因亏空被追赔,故这个园子就到了他的继任人的手里。”^⑤

比较而言,胡适又从随园的来历、曹頔的遭遇方面论证了他相信随园说的理由,这要比周春、太冷生诸人持之无故、近乎谩骂的否定,显得可信一些;当然,胡适之所以肯定随园说,无非是为他提出的《红楼梦》是“自叙传”说的观点提供依据。1961年,主张《红楼梦》为“他传说”的吴世昌重提大观园即随园的说法,他在《红楼梦探源》中指出:“俞平伯与顾颉刚证明袁枚说谎,并不能成立。……证明大观园即随园旧址并不是小说中所有故事均在南京发生。……我们已经指出:作者摆脱时间限制,有时把相隔数十年的事融合为一。同样的,作者摆脱空

①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4页。

②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7页。

③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20页。

④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651页。

⑤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6~27页。

间限制,把影片叠印起来,产生一种和谐而不是互相矛盾的效果。”^①吴世昌的看法是一以贯之的,直到1980年,他在《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中继续主张随园说,他写道:“书中所记‘风月繁华之盛’的故事,发生在雪芹的江宁织府’内或根据‘织府’中的事迹而编写”,“‘大观园’在南京,其故址即‘随园’。这些话都是雪芹亲自告诉明义的。否则住在北京的明义怎能知道曹家上世在南京的事。”^②吴世昌认为,贾宝玉的原型就是脂砚斋,所以脂砚斋生活过的曹家花园,就成了大观园的原型。

1921年,顾颉刚与俞平伯频繁通信讨论《红楼梦》,对于大观园即随园说,顾颉刚先是怀疑,继而否定,他先是“疑大观园不即是随园”^③,继而发现袁枚所说的诸多矛盾。第一,袁枚的生年(1716)与雪芹的生年(1715?)不远,但袁枚却说“相隔已百余年矣”,“可见此老之糊涂”,他又查了《江南通志》《江宁府志》及《上元县志》,它们“都没有说小仓山是曹家旧业”,“可见府志书的不载,正好反证曹家并无此园了”。第二,袁枚所记曹家事“到处错误”,同时发现了“大观园不在南京”的几条证据:(1)《续同人集》载张坚赠袁枚诗之序有“白门有随园,创自吴氏”和诗句“瞬息四十年,园林数主易”,可知随园的主人有吴、隋、袁数家了。(2)袁枚《随园记》作于乾隆十四年,记中说其经过次序是买园、翻造、辞官、迁居,“这许多事情必不是三个月所能做的,则买园当然在乾隆十四年之前”,而乾隆十三年袁枚修《江宁府志》并未将随园入志,“而直等看见了《红楼梦》之后方说大观园即随园,这实在教人不能相信”^④。顾颉刚提出的证据和意见,俞平伯认为是“铁案如山不可动摇。从此,《红楼梦》之在南京,已无确实的根据,除非拉些书中花草来作证”。他并且主张“可以借作者的生平,参合书中所叙述,积极地证明《红楼梦》之在北京”,他的确是“以书中主要明显的本文,曹氏一家的踪迹,雪芹的生平”三点证据进行“推较”,“断定《红楼梦》一书,叙的是北京的事,……袁枚的话是个谎话”。尽管如此,俞平伯“觉得疑惑没有销尽”,认为如果对此问题“遽下断语,是万分危险的”,因此,他审慎地“声明”要“保留将来的‘撤销原判’底权利”^⑤。果然如此,三十多年之后的1954年,他在《大观园地点问题》一文中说道:“这里有三种的因素:(一)回忆,(二)理想,(三)现实。以回

① 吴世昌:《红楼梦探源》,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转引自宋淇《论大观园》,见宋淇《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中国书店2000年版,第36页。

② 吴世昌:《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

③ 顾颉刚:《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附录”,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④ 顾颉刚:《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附录”,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册,第42页。

⑤ 俞平伯:《红楼梦辨》,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册,第218~219页。

忆而论,可在北京,亦可能在南京。曹頌罢官以后尽管住在北京,但作者忆想他家的盛时,在金陵曾有一个大大的花园,这可能性依然很大的,亦即所谓‘秦淮残梦忆繁华’,袁子才所谓‘大观园即余之随园也’,究竟是否谎话,亦不易确说。”^①周汝昌则对随园说彻底否定,认为“袁氏的话毫无根据,所谓向壁虚造,信口开河”,并坦白自己“曾认为‘随园或亦本属曹家所有’,……这话还是受了胡适的影响”^②。

1978年,卞孝萱发表了《驳斥胡适大观园即随园的谬论——从随园历史说到新发现的〈随园图〉》一文,其题目即显豁地表明了主题。他首先对随园的来历做了资料上的分析,并列出如下简表(见表1):

表1 随园来历分析

(明)	(清康熙时)	(雍正时)	(雍正、乾隆时)	(乾隆时)
焦氏随园	吴园	隋园	酒肆	袁氏随园

进而他又将陈从周发现的乾、嘉时人汪荣所绘的《随园图》与袁枚、袁祖志所记的随园景色做了对照,发现《随园图》的景色与袁枚、袁祖志所记载的随园相合,而它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没有相似之处”,“袁枚的随园,是一个具体的园林,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曹霑从当时的名园,选取素材,经过加工、改造,运用文学语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大观园’不是反映某一个具体的园林,而是当时南北园林优点的综合,比具体的园林,更典型,更理想。”^③客观地说,卞文在否定大观园即随园说的文章中是很有说服力的,它写法上的别具一格倒在其次了。

二 北京恭王府说

恭王府位于北京什刹海以西,其建筑和花园占地6万多平方米,是著名的风景区,因同治年间由恭王奕訢居住而得名。一直到民国时期,还有恭亲王的后代居住其中。恭王府于1932年卖与辅仁大学做校舍,现由中国音乐学院、红楼梦研究所等单位用作校舍和办公用房。《红楼梦》第十七至十八回,宝玉与众姐妹

① 俞平伯:《大观园地点问题》,原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4月23日,转引自《俞平伯论红楼梦》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51页。

②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48页、第149~150页。

③ 卞孝萱:《驳斥胡适大观园即随园的谬论——从随园历史说到新发现的〈随园图〉》,《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2期合刊。

奉元春之命为大观园题咏，宝钗有一首七律，首联云：“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①后人正是据此寻觅“帝城”——北京城西各个旧王府邸，经过实地考察和文献推考，有一些人提出了恭王府就是大观园的原型一说。

较早论及恭王府与大观园之关系的是中国古建筑史学家单士元。1938年12月，他发表了《恭王府沿革考略》一文，考证了恭王府的历史沿革情况，并附有《庆王恭王世系略表》，基本上否定了恭王府说，因为据他考证，恭王府的先后主人是和珅、恭王、辅仁大学，换言之，恭王府的建筑是在曹雪芹死后，曹雪芹岂能以恭王府为大观园的原型？他说：“府之最初历史，有谓为康熙间大学士明珠旧第，遂以说部《红楼梦》大观园附会之。关于此点，文献无征，殊难置信，仅属间巷传闻，聊资谈助而已。”^②1962年，时值学术界和文化界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开展一系列活动，大观园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纷纷前往恭王府实地考察。吴柳前去向曾写过《恭王府沿革考略》的单士元请教恭王府的相关问题，单士元却修正了自己二十多年前的看法，他对吴柳说：“我在二十年前随陈垣校长，看恭王府，写过‘考略’，文中提到，因文献无征，否定了恭王府是《石头记》中大观园之说。不过，二十年之后，我又看过一次，却相反，我认为恭王府是大观园遗址，完全有可能。园里面有座‘戏楼’，看得出那是清初的建筑。恭王后人溥儒先生是名画家，他所住的那座房子，是雍正年代的建筑。从这些线索看，园子的历史还要比和珅的时代早得多。我想，曹雪芹生前可能见过这房子。”^③因此，吴柳专程实地考察了恭王府，写出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京华何处大观园》，他把书中尤二姐所在的小花枝巷、黛玉走过的路、凤姐所经营的后楼、大观园的水、潇湘馆、大观园的后门等所描写的具体情景与恭王府建筑格局对照合观，基本上坐实大观园的原址就是北京恭王府。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大观园的原型即北京恭王府一说的代表作。在其影响下，报刊上登出了不少探索大观园原型的文章。其实，早在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中，周汝昌就“疑心”曹雪芹老宅即恭王府，“其地点乃是在禁城西北角的这一处”，“总之，曹雪芹的园子，是有模型在胸的”^④。1976年，《红楼梦新证》增订后再版，在第四章“地点问题”末尾有一则“补说”，其中写道：“我写本节文字时，根据小说所叙，推断大致的地点位置，那时并不知道任何别的线索。随后因看乾隆京城全图，发

① 笔者所引《红楼梦》原文除注明者外，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单士元：《恭王府沿革考略》，《辅仁学志》第七卷第二期合刊，1938年12月，转引自顾平旦编《大观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页。

③ 引自吴柳《京华何处大观园》，《文汇报》1962年4月29日，转引自顾平旦编《大观园》，第327页。

④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142页、第150页。

现所推的那一带正好有一处府第,就是和珅府,后为庆王府、恭王府者是。再后来,才又知道过去居住此府的人以及附近的邻居都世代传说,相沿称此宅为‘西府’,其东邻另一府为‘东府’。”^①他后来发表的长篇论文《芳园筑向帝城西》以及专著《恭王府考》,则援用大量文献、传说资料与《红楼梦》中所写的景点和建筑布局两相比对,认定恭王府即大观园的原址,《恭王府考》“开门见山”地写道:

我是主张,曹雪芹的荣国府大观园,有其实际地点的基本素材作为蓝本,这个地点即相当于北京什刹海(前海)稍西的恭王府。^②

从而把大观园即恭王府说推向了极致。他在研究大观园原址问题上用力最多,影响也最大。

三 江宁织造署西花园说

此说的提出者是美籍华人赵冈。早在1963年,由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考证拾遗》中,赵冈就提出:“康熙南巡时,数次都以曹寅的织造署为行宫。书中大观园的规模正与此相当。……书中甄家一直都在南京,正暗示故事的地点是在南京,而非北京。”^③到了1970年,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的《红楼梦新探》中,赵冈进一步写道:“南北互调是雪芹秘法之一。……大观园真址之建造是为了康熙南巡当行宫之用。这个南巡行宫图,今尚保存。其院亭花园的规模及配置很类似书中的大观园。”^④在1971年5月1日台北《东方杂志》复刊第四卷第十一期上,赵冈针对大观园的原型即恭王府说,发表了题为《北平恭王府是大观园吗》的文章,认为“恭王府绝非曹雪芹在《红楼梦》书中所描写的大观园”,因为“恭王府的殿宇是雪芹卒后二十年才出现的。……因此,大观园的模型是曾为康熙行宫的江宁织造署,而不是北京城内的恭王府。”^⑤1980年,他又写了《再谈大观园》一文,重申了他的观点。他首先指出:“我个人的看法是,曹雪芹的想象力并不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丰富,小说中虚构的部分往往写得不好,毛病与矛盾迭出。”他举出贾赦及其二子贾琏、贾琮以及书中描写方向多处“矛盾

①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上册,第150页。

② 周汝昌:《恭王府考——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③ 引自顾平旦编《大观园》,第247页。《红楼梦新探》出版于1970年,《大观园》误署为1960年。

④ 引自顾平旦编《大观园》,第247页。

⑤ 引自顾平旦编《大观园》,第247页。